

安 全 理 事 会

PROVISIONAL

S/PV.4087

10 January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〇八七次会议逐字记录

2000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 30 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戈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成员国: 阿根廷

利斯特雷先生

孟加拉国

乔杜里先生

加拿大

杜瓦尔先生

中国

秦华孙先生

法国

德雅梅先生

牙买加

达兰特女士

马来西亚

哈斯米先生

马里

乌阿尼先生

纳米比亚

阿马蒂拉博士

荷兰

范瓦尔苏姆先生

俄罗斯联邦

格蒂列夫先生

突尼斯

穆斯塔法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杰利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上午 10 时 3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局势

艾滋病对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想通知安理会,我收到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巴西、佛得角、古巴、塞浦路斯、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蒙古、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葡萄牙、大韩民国、塞内加尔、南非、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代表的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根据惯例并经安理会同意,我建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反对意见,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巴利先生(阿尔及利亚)、温斯利女士(澳大利亚)、丰塞卡先生(巴西)、莱昂·蒙泰罗先生(佛得角)、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先生(古巴)、扎克海奥斯先生(塞浦路斯)、伊莱卡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奥尔埃耶先生(吉布提)、穆罕默德先生(埃塞俄比亚)、维比索诺先生(印度尼西亚)、文托先生(意大利)、佐滕先生(日本)、杜尔达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恩赫塞汗先生(蒙古)、波尔斯先生(新西兰)、姆巴内福先生(尼日利亚)、亨宁斯塔德先生(挪威)、布里托先生(葡萄牙)、李时荣先生(大韩民国)、卡先生(塞内加尔)、库马洛先生(南非)、基永加先生(乌干达)、卡桑达先生(赞比亚)、斯坦普斯博士(津巴布韦)在安理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在安理会此前的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其暂定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

芬森先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马克·马洛赫·布朗先生、以及联合国艾滋病/艾滋病联合方案执行主任彼得·皮奥医生参加会议。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欢迎沃尔芬森先生、马洛赫·布朗先生和皮奥医生,并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感谢安理会成员让我荣幸地主持会议并感谢他们以探索世界安全的全新的定义来欢迎这个新的千年的来临。今天是安全理事会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举行的 4 000 多次会议中首次将健康问题作为一个安全的威胁来进行讨论。我们在谈到对安全的威胁时往往首先想到战争与和平。然而,任何人都不會怀疑,由于艾滋病毒/艾滋病所造成的最大破坏和生命损失确实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安全议程的核心是保护生命。我们现在知道,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将不少于在整个二十世纪中死于所有战争中的人数。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每一分钟就有 10 个人染上艾滋病;1 100 万儿童已经成为艾滋病造成的孤儿,其中很多人不得不由其他儿童来抚养;仅就这一种病就威胁着从经济实力到维持和平所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显然面临着最严重的安全威胁。这个历史性的会议不仅承认普遍流行的艾滋病——我将在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所作的发言中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讨论——对世界安全所构成的实际和近在眼前的威胁,而且是这个安理会所进行的关于非洲大陆所面临的特殊挑战的为期一个月的集中讨论的开始。

我们今天首先集中讨论艾滋病问题这个强有力的事实还具有更大的意义:它为安全理事会关心更广泛的安全问题并就其采取行动创立了先例。通过榜样的力量,这次会议要求我们以新的和更多广泛的角度看待安全并在此后总是根据一种新的和更多广泛的定义思考这个问题。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安全理事会处理了在作出共同努力以抵抗侵略和停止武装冲突的基础上建立的传统安全议程。我们看到了各国之间的战争以及各国国内的

具有战争规模的暴力。这方面的原因很多:因为有些人自认为有宗教或种族方面的优越性;因为以意识形态掩盖着或以地理战略理论作为辩护理由的权力欲;因为有些人感到,一个小的地区或一个较大的区域,甚至整个世界本身都没有让所有人有生存和繁荣的空间,除非强者可以统治弱者;因为太多的人倾向于只把自己看作是不同于其他的组群,并通过丑化其他组群和贬低其人性来庆祝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独特性;因为贫困使人们丧失希望和期望,并使社会分崩离析使人们首先陷入绝望,随之开始愿意接受邪恶者的领导。

但是,虽然全球社会仍然面临着旧的威胁,但实际上正在促进新的事物和新的力量,这些新事物和新力量现在或很快将挑战国际秩序,提出和平与战争问题。在我们的世界进入 2000 年时,重要的不是我们的日历的改变。重要的是,在这个象征意义的由旧向新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处在人类全部历史中的少有的宝贵时刻中,我们有机会通过谋求一致同意公开承认潜伏在每一个人心中的日益增长的一个强有力的新真理而使我们成为我们希望在世界上看到的变化。现在是改变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方式的时候了。

从这个新的角度,我们必须塑造和遵循一个世界安全的新议程,这个议程包括全球环境挑战,除非我们成功的处理这个挑战,我们的所有其他进步都会变得毫无意义;粉碎现在跨越我们的边境的毒品和腐败的全球性挑战;由于小到可以隐藏在一个大衣口袋中的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存在而变得更加严重的恐怖所构成的全球挑战;使整个社会成为废墟的新的普遍流行病;那些对保护过过去三代人的抗生素具有可怕的抵抗力的旧疾病的新型病菌的出现。

实行我们的新的安全议程应该有决心、充分的资源和对世界所拥有的新的工具——例如互联网和正在出现的全球信息基础结构——的创造性使用。可以通过使用这些工具使我们联合起来进行成功的共同努力。这些工具如果能得到有想象力的使用将使各国、非政府组织和各级公民取得更深入的见解与合作。我们的任务不仅是承认和面对这些挑战,而且是达到我们的更高理想并共同努力使我们的最

辉煌的梦想成为我们的儿童的生活现实。

我认为,为要同地球上数目仍在增长的几十亿人一道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建立这样一种世界,即:在这一世界中,人民坚信自己有能力进行自我管理,这种信念使人民自身的潜能释发出来,并证明他们所抱所有人都将享有不断增强的人类尊严和自给自足这种愈益强烈的信念是正确的;一个拥有自由和自由市场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思想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以及心情享受教育使根本自由得以维持;在这一世界中,父母能够自由选择家庭的规模,同时相信他们所给这个世界的子女将能够生存下去,成长为健康的成人,并在繁荣与和平的社区里享有经济机遇;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不但教育男童,而且也教育女童,在一切地方确保妇女权利,使之成为人类大家庭的正式成员。

所有这些都形成了我们这个时代重大的全球性挑战:在我们寻求建立所有人的更新式的安全世界时,创造和加强团结感。这种安全不仅仅是避免生命损失和战争蹂躏,而且是一种没有不断的恐惧和伤害的那种安全,是人人都应享有的生活质量和精神自由不被剥夺的安全。

如果我们要成功地解决这一新的安全议程,我们必须认识到,由于我们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我们处处可以随心所欲掌握的新技术具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能力,过去曾经可以忍受的错误现在则拥有无数倍的后果,例如,在几乎所有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自己的环境,却不足以给环境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人们可以在世界上发动战争,却不足以摧毁这个世界。但现在,过去是地方性的威胁足以拥有区域或全球性后果;过去是暂时的伤害现在可能成为长期和毁灭性的伤害。

作为国际社会,我们必须向我们的人民证明我们有足够的聪明才智使我们从智慧创造出来的事物得到控制。我们必须了解,老式的全球安全概念——几乎完全集中在军队、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必须加以扩展。我们需要证明我们不仅能够制约侵略、防止战争和调解冲突,我们也能够齐心协力期待一个具有新的全球

性需要的所世纪,并对之作出反应。

人类的智力——我们的创造发明、我们的梦想、我们永不休止地寻求做得更好——造就了这一时刻。现在,人类的心灵和人类的意志,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的意志,而是真正联合国的集体意志必须把握住这一时刻。我们必须使之顺从生命而不是死亡,使之顺从正义而不是压迫;使顺从机遇而不是贫困,这就是为了我们所继承的新世界所要建立的新安全。未来并不是我们仅仅试图预料的事物。未来是我们共同为我们自己创造的事物。怀着对我们的原则、我们的预见力和我们共同的人性的坚定信念向前进,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西班牙诗认安东尼奥·马查多说过,

“行路人呐,原本并没有路;路是我们走出来的”。

此次造路的会议给人们很大的希望。主持这次会议是一种荣誉。我的希望是,千年的头几天和头几年以及随后的年代将受到作为这次会议标志的远见的指导。我们生活在新的时代。我们面临新的更大的责任。我们能够而且必须面对这些责任,因为人类面临的新威胁就像战争一样严峻,而我们拥有的新的希望就像和平一样珍贵。

安全理事会现在将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我个人很荣幸请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讲话。他为和平与安全的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感谢你,副总统先生;也许我应该说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先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正在争取。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所作的有创见的发言。你今天到会确实是新年的一个给人以希望的开端,是你的国家对联合国承诺的证明,值得欢迎。

在我们开启这一新的千年之际,我们许多人都感到十分欣慰。世界上大多数地

方实现了和平。我们绝大多数人受到的教育都好于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我们将会更长寿,具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选择。但我们也面临新的挑战,或者说正面临以令人震惊的新形式出现的旧的挑战。例如,环境恶化、种族冲突、管理失当或管理不善、普遍的侵犯人权行为、文盲和健康不良、国家内和国家之间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更严重的是,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民无法享受全球化的好处,人类有将近一半的人因此而长期处于贫困之中而无法得到解脱。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不存在这些问题。但看来非洲更加严重。今天世界上 48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33 个是在非洲。世界上发生的 24 个甚至更多的冲突中,大约一半发生在非洲。15 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目前正面临极其严重的食品紧急状况。仅仅刚果民主共和国,1 000 万人民的食物供应因内战而受到威胁。全球艾滋病造成的 1 100 万孤儿中,非洲儿童占了 90%。

这些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这些数字充分说明,正如非洲统一组织将今年确定为非洲和平、安全与团结年一样,你们国家将这一新纪元的第一个月确定为安全理事会非洲月的决定是正确的。非洲人正在走在前面,这是很好的,因为对于真正和可靠的和平的期望必须是来自于处于冲突中的人民,尤其是要来自于他们的领导人。

非洲大陆许多地方正在取得显著的进步。没有必要向非洲悲观主义低头。相反,现在是国际社会团结起来支持非洲的最好不过的时机了。在这个非洲月中,安理会将第一次会议致力于艾滋病,这是完全适当的。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样的问题应该交由联合国其他机构去讨论。但我认为,如果安理会提出了非洲月却没有讨论霍尔布鲁克大使所说的非洲今天面临的头号问题,安理会的工作就没有做好。

艾滋病并不是仅仅非洲才有的问题。非洲之外有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和东欧,艾滋病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传播。但在其他地方,艾滋病都没有成为像现在非洲南部和东部这样影响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威胁。艾滋病对该地区的影响不亚于战争本身造成的破坏。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艾滋病的影响更甚。去年,艾滋病在非洲造成的死亡人数是武装冲突造成死亡人数的 10 倍。

艾滋病破坏了非洲大陆的保健服务,造成数百万孤儿,夺走了大批医务工作者和教师的生命,因而正造成社会和经济危机,这些危机反过来威胁政治稳定。由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杰出人士高死亡率,艾滋病还威胁善政。

在已经不稳定的社会中,这种各种灾难混合物是造成更多冲突的因素,冲突反过来为更多感染提供滋生地。保健和教育服务中断,人道主义援助受阻,整个人口流离失所:所有这一切确保这一传染病在该大陆进一步地、更快地蔓延。

简而言之,艾滋病毒/艾滋病不仅仅是一个非洲问题。它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必须承认这一点。但是在这一国际义务范围内,在非洲防治艾滋病的斗争是一个眼前的优先事项,必须成为我们在该大陆争取和平与安全的工作的一部分。

正如大部分非洲政府现在认识到的那样,在这场防治艾滋病战争中要打赢的第一场战斗是打碎包围艾滋病的沉默和耻辱之墙。

一个月前,我们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第一次各非洲政府和联合国直接参与防治艾滋病斗争的各机构以及各捐助国政府、私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高级别会议。我要求他们在今年 5 月之前制订一项与这场危机规模相称的反应计划,并且阐述了这场斗争中每一个伙伴的具体责任。

现在我非常高兴地欢迎安理会成为另一个伙伴。我建议,安理会的作用必须是防止冲突造成艾滋病传播和阻碍其他伙伴正在为控制艾滋病所作的努力。

在这次会议稍后阶段,安理会将听到我的同事吉姆·沃尔芬森先生、马洛赫·布朗先生和彼得·皮奥先生介绍有关这一传染病的经济和社会以及与健康更加直接相关的方面的情况。我相信,他们的发言——加上你本人主席先生和其他成员的发言——将有助于向全世界表明,联合国系统各部门正给予非洲问题应有的、非洲人应该得到的重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和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一开始要说:艾滋病毒/艾滋病不是其他人的问题。它是我的问题;它是你的

问题。如果允许艾滋病蔓延,我们就面临我们的年轻人将活不到成年的危险。他们的教育将白白浪费,经济将萎缩,将有大批病人,而保健制度将不能够维持他们的生命。

这不是我说的话。这不是在美国或在联合国说的话。这些话是我的朋友——南非总统卡博·姆贝基在一年多前宣布南非在防治艾滋病斗争中的伙伴关系时说的话。同样的话不仅应该在南非说,不仅应该在非洲说,而且应该在全球说。在非洲,这场危机的规模也许更大,基础设施也许更加脆弱,人民也许更加贫穷,但是这一威胁对全球各地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国家都是真实的。

没有任何边界能够阻止艾滋病。艾滋病超越了把我们分割开来的所有界线。我们对自己和对其他人负有最终的责任采取行动在全球范围内,尤其在这一祸害最大的地方防治艾滋病。艾滋病是一个必须打败的全球侵略者。

在我们进入新千年之际,非洲进入了巨大进展的第一个领域。在过去 10 年中,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从专制统治走向民主,接受了经济改革,开放了市场,使企业私有化,以及稳定了货币。一半以上的非洲国家现在选举它们自己的领导人——差不多是 10 年之前的四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增加了三倍,为整个非洲大陆更高生活质量开辟了前景。

不幸的是,正当这一历史性的进展得到巩固的时候,它却由于艾滋病传播而陷入危险,现在有 2 000 万非洲人患艾滋病。1 400 万人已经死亡,其中四分之一是儿童。每天,在非洲有 11 000 多男人、妇女和儿童感染艾滋病毒,其中一半以上不足 25 岁。

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来说,艾滋病不仅仅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它是一场安全危机,它不仅仅威胁每一个公民,而且威胁确定和捍卫一个社会特征的机构。这一疾病削弱劳动力和经济实力。艾滋病袭击教师,使他们的学生无法受教育。艾滋病袭击军队和腐蚀治安和维持和平部队。

艾滋病正在非洲造成的重大伤亡使美国深受震动。与此同时,我们知道我们自

己的国家没有在防治艾滋病的斗争中取得我们应该或必须取得的成就。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国卫生总监大卫·萨特切尔博士今天和我在一起。他最近的报告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克服导致感染的无知和满不在乎的态度。我们必须继续研究其他国家的成功,与此同时我们努力与其他国家分享我们已经取得的任何进展。

作为副总统,我四次前往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我请萨特切尔博士陪同我进行了其中的一次访问。我还带了高级卫生官员、艾滋病专家、企业领导人和医生一同前往。我们与非洲领导人一起度过了很长时间,听取他们的意见并讨论他们在致命的艾滋病危机中的困难。令人鼓舞地看到在非洲有这么多人——不仅仅是领导人而且是保健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母亲和父亲以及无数的普通老百姓——努力拯救他们亲人的生命。

10 年前,乌干达是世界上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今天,由于全国动员了起来以结束耻辱,敦促人们进行预防和改变行为,感染率在乌干达现在正大幅度下降。曾经是这个问题证据的乌干达现在正强有力地证明,我们能够彻底改变预防艾滋病的情况。

我们知道,针对这一疾病的第一道防线是预防,预防取决于消除讨论艾滋病程度和风险的障碍。这正是这次历史性安全理事会会议的一个目标。今天,在全世界面前,我们把艾滋病危机放在世界安全议程的最高位置。我们绝不低声地谈论艾滋病,绝不仅在秘密会议、以秘密和羞愧的口气谈论艾滋病。我们必须正视这一威胁,就象我们在这里、在这个地球上伟大论坛之一公开地、大胆地以紧迫感和同情心正视这一威胁一样。除非我们结束艾滋病耻辱,否则我们将永远不会结束艾滋病。让我们开始决心结束与艾滋病相关的耻辱。

我们还必须做更多的工作,为越来越多感谢上帝活着而不是死去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提供基本保健和治疗。这需要卖得起的药品,但是也需要比药品更多的东西。它要求我们训练医生、护士和家庭护理人员,它要求我们发展诊所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向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保健。

今天,在非洲只有不到 5%的艾滋病患者获得甚至基本的保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为诸如肺结核和疟疾之类的机会性感染提供治疗,我们就能够延长生命、减少痛苦和允许患有艾滋病的母亲与他们的孩子生活得更久。

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的最好希望是通过接种疫苗预防艾滋病,我们致力于尽可能最大程度地研究。但是,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以利用私营部门的才能和力量。

克林顿总统 9 月在向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所有生物医学研究中仅有 2%用于发展中世界的主要致命疾病,这是不对的。他保证美国进行新的努力,以加速研制和提供艾滋病、疟疾、结核和不成比例地侵害最穷国的其他疾病的疫苗。这一预防、治疗和研究的三部分战略是一场正确的战斗,美国已为在全世界进行这一战斗捐献了 10 亿多美元,其中大半用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但我们必须做更多的事。

我去年宣布了美国对国际艾滋病计划的承诺的最大增加:1 亿美元用在非洲、印度、东欧和其他地区抗艾滋病。今天,我宣布美国决定加紧这场战斗。克林顿-戈尔政府下月将向我国国会送交的预算,将包括再增加 1 亿美元,以达到总数 3 亿 2 500 万美元,来资助我们在全世界范围抗艾滋病的斗争。这种新的资助将包括各种努力:减轻艾滋病的恶名并预防其泛滥、减少母子传染、支持基于家庭和社区的对艾滋病人的关怀、向由于艾滋病而成为孤儿的儿童提供关怀并加强卫生基础设施以预防和治疗艾滋病。

我今天上午还要在此宣布:我们下月将向我国国会送交的预算,将包括美国对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疫苗基金的 5 000 万美元的捐款。这一捐款将实现克林顿总统向大会所作的许诺,资助发展中国家的救命疫苗的研究、购买和分发。

我今天还宣布一项在抗艾滋病的战斗中扩大公私部门之间伙伴关系的倡议。实际上,我将在今后几个月中召开一次活跃在非洲的美国企业领导人的会议,以制订一套自愿的公司行为原则,使工作场所成为有关艾滋病的教育和预防的有效地点。让我们也确立这一目标。我们将在与各伙伴国的这种伙伴关系中,通过公共和

私营部门的努力来在关键点、最令人伤心的一点打破传染的循环——即母子传染的时刻。

此外,我宣布我们对明年的预算要求,将首次包括对美国军方提供的特殊资金,以同其他国家的武装部队一道抗艾滋病。在我国国内,武装部队已采取有效行动来防止艾滋病在军队中的扩散。国防部长科恩准备同我们在非洲的对应军事角色分享我们的经验。他将在这一历史性的月份中前来联合国。

我们还致力于帮助穷国获得可支付的医药,包括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医药。总统上月宣布了一项新的办法,以确保在实行美国贸易政策时考虑到公众健康的危机。我们还将同贸易伙伴们合作,确保美国的贸易政策不妨碍其为健康危机作出反应的努力。

然而要赢得正在进行的抗艾滋病的全球斗争,我们还必须战胜加速其扩散的贫穷。今年 6 月在科隆,我们同七国集团伙伴们一道提出了科隆债务倡议,这是对更快和更深度地减免债务沉重的穷国的债务的里程碑式的承诺。我们将继续使七国集团的伙伴们为此努力提供更多的资源。今天,我们要求世界上较富有、较健康的国家赶上美国对全世界抗艾滋病圣战的日益扩大的承诺。

然而更多的资金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确保更多的钱带来更多的影响。国际社会明年 7 月将聚集在南非的德班,举行第十三届国际艾滋病问题会议。全世界有很多令人鼓舞的抗艾滋病的努力。但它们现在最多只是很多孤立的努力,而不是一种单一的集中出击。我们必须汇集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组织的单独行动,以最大地利用其协作性和成功。我们将与德班会议的组织者们一道努力,推进这一根本目标。它之所以是根本目标,是因为我们如何使用资金以及如何有效地确定使用目标,而不仅仅是使用多少资金,将决定我们拯救多少生命。

艾滋病是国际社会迄今面对的最具毁灭性的威胁之一。很多人把抗艾滋病的斗争称为圣战。联合国的成立是为了制止战争。现在我们必须展开并打赢一场我们时代的伟大与和平的战争——抗艾滋病的战争。让这里和全世界所有愿意加入

这一事业的人注意聆听非洲诗人莫加尼·瓦利·塞罗特的词句并为之振奋:

“曾记否,我们在听到我们的幼儿们为命运而歇斯底里地哭泣和哭喊时,心情激动、极为疼痛和痛苦。我们听到了那些哭泣,理解它们,咽下它们。但我们仍向前冲去,懂得生活是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就是我们。”

这一希望就是我们,在该会议厅中的我们这些代表世界上数十亿人民者,必须成为希望和变化的许诺。我们必须成为生命本身的希望。我们具有产生变化的知识、热情和手段。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道德责任并接受我们的巨大和沉痛的责任,以获得成功。我们必须作出承诺并履行承诺以战胜这一疾病,以便在向后代人讲述艾滋病的故事时,它不仅将是一个人间悲剧的故事,而且是人间胜利的故事。而一故事的道德价值将是号召我们完成一项共同事业的人类精神的力量,这一事业即击败一个共同的敌人并确保我们如此众多的人类同胞的健康与希望。

上帝保佑所有那些经历这一疾病之苦并正经历这一疾病的人。上帝保佑联合国尽快和永远结束这一疾病的一致努力。

我恢复作为安理会主席的职能,很高兴在战胜贫穷的战斗中的世界领导人之一参加我们这一千年的首次会议,他就是世界银行的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我请他发言。

沃尔芬森先生(以英语发言):戈尔副总统,我首先要感谢你邀请我出席本次会议。我相信这是世界银行的总裁首次出席本机构的会议。这本是一个我并不认为会在我总裁任期内实现的梦境,所以我确实很感激你把健康和发展的的问题列入议程,你在这些问题上一贯地支持我们的机构。

我还非常感谢安南秘书长在使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其他机构更加平行和更具伙伴关系方面表现出的领导才干,我很高兴能够同我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联合国艾滋病共同方案的同事们一道出席会议。

我对安全理事会的运作了解不多。各位女士们和先生们给我的形象是在半夜开会,举行非常重要的会议,利用外交和强权政治解决我们面临的十分重要和紧迫

的问题:冲突的问题,化学武器的问题,核挑战的问题和安全的问题。有趣的是,我们在华盛顿认为我们每天在处理发展问题方面所作的事,就是导致同一个安全与和平的问题的行动。我们每天争取检查全球的情况,想到现在居住在地球上的 60 亿人民,每天生活费用不到两美元的 30 亿人民,每天生活费用不到一美元的 12 亿人民,我们想到下面的 25 年,届时 60 亿人将增长为 80 亿人。

我们不知道那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世界。

我不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也不是大使,但我知道如果人们吃得好、有机会、受到良好治理并对他们的孩子们有安全感,和生活在一个无人治理、政府机构不给他们安全和没有希望的时期相比。他们不大可能打仗和产生问题。

我们担心下一个 25 年,我想说这是一个同安理会审议直接有关的议题。

的确根除贫困和发展是安全的对应部分,而这在非洲最重要。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我们有 5 亿人,其中一半以上生活在贫困中。正如秘书长所说,正是在那里发生了当今的大部分冲突和战争。这是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问题。因此,如果非洲是议程的核心,它在这个月的确是核心——我祝贺霍尔布鲁克大使采取这一主动行动——那么艾滋病问题当然就作为涉及安全、发展和贫困的最突出问题。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当今的世界中我们正使非洲在过去 40 年中取得的某些成就消失。数字十分令人震动。在非洲人领导下,我们使预期寿命增加了 20 年以上。在许多国家这一成绩到 2010 年时将失去。前面的发言者已经提供了统计数字。但是只要想想在博茨瓦纳、纳米比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15 岁至 19 岁之间的人有 25%是艾滋病毒阳性。只要想想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一个孩子出生时因艾滋病死去的可能性大于没有艾滋病而存活。这些是令人震惊的数字。

在许多非洲国家中,十几岁的姑娘有三分之一受艾滋病之害,这在一个社区中不可能造成安全感。在若干国家,我们失去的教师多于我们能补充的教师。我们正在失去法官、律师、政府官员和军事人员。这个问题在破坏各国稳定方面比战争更实在。除非我们采取行动,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非洲大陆肯定将继续不稳定。

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发展问题。它也是影响非洲大陆和全世界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它肯定是个值得这个机构审议的议题。

全世界都希望安全理事会把各种重要问题予以突出并希望联合国给予引导。为解决这些全球问题,我们需要不仅是联合国聚会一堂,而且需要使私营部门、文明社会、各教派、诸如我们这样的组织和区域机构聚集一起。这个机构可以强调优先事项。

我很荣幸来到这里,但是主席先生,我想向你保证我在来的时候是期盼同联合国建立伙伴关系并受安理会的承认。你的继任人将处理安全问题,他们必须研究原因。我告诉你这一点:贫困和发展是大多数冲突的根源,这个机构在采取行动时必须预见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这种行动将是一个冲突的世界。

我期待着在今后的年月中和安理会共同致力于非洲的艾滋病问题和贫困与发展这个总的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两位发言将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马克·布朗先生和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共同方案执行主任彼得·皮奥先生。他们的发言将十分重要。我促请今天出席会议的人留下来领会他们发言的重要性。

在他们发言前,我打算征得安理会成员同意暂停会议几分钟。复会时,我将把安全理事会主席的锤子交还给霍尔布鲁克大使。

我想指出今天和我们一起出席会议的有纳米比亚、乌干达和津巴布韦的三位卫生部长。我们可以从这些部长那里学到许多东西,我们都十分感激他们的出席。

在休息前,我还想指出在美利坚合众国,杰西·赫尔姆斯参议员和约瑟夫·拜登参议员——以及我国两大政党的大多数——已重新表示不仅支持美国成为这个机构的一个有力成员,而且支持这一机构在各方面以各种形式所作的努力。

主持这一会议的开始的确十分荣幸。现在,安理会成员如果同意,我宣布会议暂停。

上午 11 时 15 分会议暂停

霍尔布鲁克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持会议;

上午 11 时 30 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本人很荣幸请我 20 多年的朋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发言。

马洛赫·布朗先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英语发言):显然,我们联合国大家庭的各位都对美国副总统今天上午同我们与会感到非常荣幸。即便他不在,我也要对他在这个时候就这个问题到本会议厅来并作出新的承诺向他表示感谢。

我们大家都听到各种统计数字和可用言语表达的有关其人类影响的一切言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在全世界 3 600 万患者中占 2 330 万人——占艾滋病毒/艾滋病病例总数的 69%。

当工业化世界在新感染艾滋病毒的发生率不断下降面前松一口气时,非洲却受到长期折磨。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每年因这个病而死亡的人数比全世界历次战争的死亡人数多几倍。这是一个新安全战线,我祝贺理查德·霍尔布鲁克高瞻远瞩地打破陈旧定义,提请安理会讨论世界上这个最危险的问题。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影响同疟疾等传统疾病有质的不同。它破坏社会结构,并以一个年青大陆上的青年人特别是女童为目标。该疾病深入社会各部门,破坏了至关重要的经济增长,也许会在今后 20 年把该区域的未来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减少三分之一。该疾病对已经十分虚弱和难以获得的公共服务提出庞大的额外要求,从而造成绝望争夺不足资源的情况。

这是非洲目前的情况;如不加以解决,它将成为世界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安全理事会新千年的第一次会议上在这里讨论健康问题——而非战争与和平——具有真正反响。然而,我们就此问题开会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命题,即在此新全球化世纪,各种问题将接踵而来,而在上个世纪最后几年,我们却可悲地忽视了新的冲突起因。

我们必须把这一行动视为一场在以下三条战线上进行的战争,第一,非洲的教室和诊所;第二,非洲的家庭;第三,国际行动——必须提供亟需的支助,支持非洲前

线。

该区域的人力资本正在在大幅削减。估计今后几年最严重受害国中的行医医生和教师人数会减少三分之一。然而,学校和诊所不仅是任何处理该流行病后果的防御战略的核心;而且也是文化和行为变革斗争的先锋。我们看到各种可能性。在乌干达,目前中学学龄儿童确实有可能成为几乎没有艾滋病的一代。目前各国都在采取一系列有效行动,至少承认并认识到这个问题。然而,即使有更好的全民意识,个人的排斥和由此产生的拒绝在许多地方仍普遍存在,破坏了对该疾病的妥善跟踪与管理。

改变行为需要坚决和经常痛苦难堪的诚实,因为在谈到艾滋病时经常存在一种致命的双重文化标准,即不安全性行为过多和过于不愿谈论这个问题或正视其后果。必须开始进行变革,正视该区域的麻烦遗产:即广泛存在的移徙劳工,社会准则和男女不平等现象,这些现象使得妇女和女童很难拒绝男性性行为,导致女童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比男童高 3 或 4 倍。

让我建议安理会采取一整套行动。首先,我们必须支持非洲前线防治该疾病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在提高觉悟导致坦率讨论,从而导致行为改变的地方,这一势头是可以打破的。然而,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该区域自己的舆论制造者——国家机构、社区媒介、乃至城镇和村庄——领导这场运动。

第二,我们必须促进国家间合作,以便把乌干达的最佳实践有效转让给做得不那么好的国家,最佳实践指的是有力的国家计划和充分的社区动员——完全如此。

第三,我们需要资源,美国每年有 40 000 个新病例,但每年都从各种渠道为预防、照顾、治疗和研究支出大约 1 百亿美元,而非洲每年有 400 万新病例,但非洲的艾滋病毒/艾滋病相关活动却只花费大约 1.65 亿美元。我们必须动员更多的力量,今天作出承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绝妙开端。

第四,我们需要作出协调一致的回应。我是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共同赞助组织委员会现任主席,这些组织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

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我们双边组织、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必须共同在国家和全球两级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对成立非洲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国际合作组织表示赞扬,这是涉足私营部门支助的并可负担得起的保健制度的一个步骤。

第五,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已同艾滋病方案和若干创新基金会一起,着手创建一种新型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将通过保证可负担得起的疫苗市场,鼓励制药公司的研究与开发活动,非洲市场对国际医药商来说现只占全球工业的不到 1.5%。这种新奖励办法的“提升力”必须同增加基本公共健康研究开支的“推动力”结合起来。

第六,我们不能陷入一种全球两级治疗制度:即富者有药而穷者无望。虽然必须强调预防,但尽管治疗成本高昂,我们仍不能忽视治疗。我们必须同制药业合作,努力降低治疗成本。

第七也是最后,我们不能脱离更广泛的发展情况来制止这种流行病。虚弱的政府、糟糕的服务和经济失败都可直接转化为疫苗失灵和供血污染的连环。更广泛地说,这意味着学校、家庭、工作场所和经济无法迎接这种挑战。在官方发展资金行将枯竭的本区域,我认为我自己正在努力扭转开发计划署自己作出的预测,即本署明年用于非洲的资源将仅为五年前的三分之一。

因此,好消息是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工作得到了更多的帮助,减免债务取得了进展,私营部门的供资情况有所改善,但仍存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该区域的基本发展需要仍没有得到满足。存在着资金缺口以及管理和能力缺口。资金和体制都未充分到位。

安理会各位成员,在本世纪安全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你们给安理厅带来了发展。你们把这个问题从一个长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升为一个现存的危险,一个必须在政治上作为优先事项加以解决的弱点。艾滋病毒/艾滋病特别残酷地表明了发展所面临的更大范围的挑战。它生动地指出了范围更广的一个方面:也许没有其

他任何挑战能够如此确定本世纪的大方向,要么走向所有人的全球化,要么回到修筑围墙和篱笆的世纪。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马克·马洛赫·布朗在一问题上所作的巨大贡献,如同在吉姆·沃尔芬森领导下的世界银行所做的那样。

在我请下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我谨欢迎——我对刚才没有这样做表示歉意——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中最新的成员,他是今天上午提交全权证书的阿根廷的新大使。我向他表示欢迎。并且,我也欢迎五个新成员——孟加拉国、牙买加、马里、突尼斯和乌克兰——进入安全理事会,并感谢离任成员的参与。我期待着在今后几周里同各位一起工作。

我现在荣幸地请联合赞助的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艾滋病方案)主任彼得·皮奥特医生发言。

皮奥特医生(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理会今天给我机会在安理会就我认为本世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发言。20 年前,全球社会甚至没有听说过艾滋病。日积月累,从那以来有 5 千多万人已经染上艾滋病。今天在安全理事会讨论艾滋病,因为它是一个不同一般的健康或发展问题。正如我们听说,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至少在非洲,它已经成为一个人类安全的问题。

要了解这一传染病的全部范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听秘书长说有 1 100 万孤儿。低估他们的个人悲剧对非洲的发展与稳定的长期影响将是短见的。

战争是艾滋病的工具之一,正如强奸也是战争的工具之一。冲突和随之产生的人口流动助长了这一传染病。难民男子和特别是妇女极易受到艾滋病毒的感染。只要把艾滋病当作其优先事项之一,受过预防艾滋病毒和行为改变的良好训练的人道主义援助人员和军事及警察部队能够成为预防工作的生力军。

但也有一些好消息,今天上午我谨着重谈谈好的方面。在这一传染病面前我们并非束手无策。在提供有利的政治领导、公开面对问题并共同作出广泛和全面反应的国家里,形势正在扭转,正在取得明显的成功。我们听说乌干达发生新的感染

的比率正在下降。在非洲的几个社区中情况也是如此。在塞内加尔,由于发动了成功的预防运动,艾滋病毒感染的数量保持在很低水平上。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有效的方法:20 年来的经验表明了一项有效的战略所包含的基本要素。让我提到其中的六个:第一,正如戈尔副总统所说,能见度、公开性和消除羞耻感,绝不妥协;第二,通过社会政策解决在艾滋病毒方面的核心弱点;第三,认识到在预防和照顾努力之间的协同作用;第四,对最容易受害的人进行集中干预;第五,鼓励和支持社区强有力地参与作出回应;以及最后,把重点放在作为该大陆未来的年轻人身上。

在过去 12 个月里,许许多多非洲领导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表了意见,打破了在这一传染病方面的沉默和羞耻感。国际上的形势也在转变。本次会议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去年 6 月,大会特别会议根据在一些国家里所取得的成功,为 2005 年确定了一个新的发展目标,要把年轻人新的感染人数减少 25%。

安理会各位成员,挑战是巨大的,但国际社会的技术、财政和政治资源也是巨大的。但是,光在财政需求方面,我们在达到目标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有的最近的 1997 年的数字表明,国际社会为非洲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只提供了 1 亿 5 千万美元用于艾滋病的预防。马克·马洛赫·布朗从正确的角度谈到了这一点。为了维持并扩大乌干达、塞内加尔和其他国家预防工作方面的成功,我们需要每年调动 10 亿至 30 亿美元。值得思考的是,过去几年里为了减轻另一个病毒、千年虫的损害,成功地动员了数千亿美元。

去年,非洲政府、联合国系统、国际捐助者、公民社会和私人部门携起手来结成了在非洲同艾滋病作斗争的一个新的国际伙伴关系。正如安理会已经听到,上个月秘书长就在本大楼里交给我们一项任务,要制定同这一传染病相称的反应措施。

最后,让我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一伙伴关系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决心做到的事情。第一,非洲政府承诺为有效的分散行动创造环境并积极保护和促进人权,以减少羞耻感。吉姆·沃尔芬森和马克·布洛赫·布朗已经强调,在联合国系统内,这一传染病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

但是,仍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将强调额外的资源和重新分配现有资源,对这一传染病作出反应,并采取一致行动支持各国政府和公民社会,包括让携带艾滋病毒的人参与对应措施之类的行动和支持减少母亲向孩子传染艾滋病毒的努力。

第三,我们期望捐助国政府采取一致行动,在国家制定的战略计划下,在制定优先秩序时把艾滋病当作主流问题,并接受把对非洲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援助翻三倍的挑战,作为向国际对应措施提供更合理的资金的第一步。几国政府最近大大增加了承诺的款项,随着戈尔副总统半小时之前宣布的最近的这一步骤,美国是首先在过去六个月里把其承诺水平翻三倍的国家。

第四,正如戈尔副总统和马克·马洛克·布朗也强调的那样,我们同意,私人部门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参与,立即行动起来,加强工作场所和社区的拓展干预,并进一步同政府携起手来,平衡知识产权同发展和提供救命药品和其他商品的紧迫需求的困难问题。

最后,包括宗教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可发挥关键作用,在这一传染病的前线加紧工作。

安理会各位成员,我今天上午向各位带来的信息是紧迫的,但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信息。正在动员资源,世界正在作出反应。我们现在只作了 10%的工作。我们在座的各位必须承诺要完成 50%然后是 75%和更高比例的工作。

在对这一传染病作出反应时有两条底线。未来的底线就是我们必须发展并提供预防艾滋病毒感染所需的廉价的疫苗。这是今后的底线。但是,今天的底线就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做我们知道有效的工作:减少脆弱性、通过行为的改变预防艾滋病毒的感染并支持大规模的执行努力,提供延长生命和改善生活所需的照顾、药品和服务。

在这一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我认为没有任何发展问题比它更加迫切地需要国际社会作出集体反应。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它不是非洲问题或者亚洲问题,它是一个全球问题。安全理事会能在本千年第一个月开会讨论非洲的艾滋病问题,这本身

当然具有象征性意义。我认为,它标志着我们制止这一流行病的集体意志,以及我们向历史保证,我们绝不会放弃不顾,让艾滋病摧毁另一代非洲青年男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皮奥博士的富有灵感的领导和他对我国副总统发言所讲的客气话。

我们现在开始安全理事会成员的讨论。我向观众中不了解规则的人们解释,安全理事会成员先发言。然后,由于这次会议的特殊性,任何其他愿意发言的联合国成员将应邀发言。

除一项例外之外,我将请安全理事会成员遵守格林斯托克大使上月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很成功地确立的规则,这实质上就是五分钟规则。发言者还应发言具体。我将提出的例外当然是为了千里迢迢前来这里向我们交流他们经验的三位卫生部长。

我感谢纳米比亚卫生部长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议,我现在非常荣幸地请她发言。

阿马瑟拉博士(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大会最近一次公开活动是在世界艾滋病日,各行各业的男女和儿童来向这一祸害的受害者表示敬意,他们有的陈述他们真实生活的经历,有的陈述他们家庭的经历。今天,本千年安全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强调的正是非洲的困境和它同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斗争。

我高兴地注意到,1月13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将向安理会介绍非洲数百万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现在所处的非人状况。除其他问题外,她无疑将谈到艾滋病毒/艾滋病尤其对难民妇女和女童的影响。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执行主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署长和世界银行行长已经为我们详细地分析了艾滋病毒/艾滋病在非洲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今天这次非常引人注目的会议的本身并非目的,而是集中注意艾滋病毒/艾滋病对非洲影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

主席先生,你个人也在很大程度上亲自参与,这说明你本人和贵国政府对非洲事业的承诺。贵国已在制止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和改善已患病者生活质量方面

取得了重要的全国性成果。我们呼吁贵国政府带头动员制药工业同非洲国家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使非洲能够得到较廉价的拯救生命和提高生活的药品,治疗艾滋病。

我们感谢秘书长的参加。他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提出的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A/54/1),非常清楚地阐述了艾滋病毒/艾滋病对非洲的影响。我们鼓励他继续倡导这一问题。

任何威胁非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问題也威胁非洲的政治稳定。只要艾滋病毒/艾滋病继续流行扩大,政治稳定与和平必定受影响。由于政府没有能力有效地满足得病者的需要,愤怒和挫折感便会继续上升。社会基础设施,如医院,无法应付进来的许多病人。虽然知道有药物可以延长和改善生活质量,但是非洲各国政府没有能力购买这些药物。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把安全看作是影响我们认识和处理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方式的各种问题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我们欢迎今天的会议。

今天,非洲 2 300 万人染上艾滋病毒/艾滋病——统计数字显示是 2 100 万或 2 300 万都无关紧要;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一个仅占世界人口 10%的大陆现在或许有世界上艾滋病毒患者总数的 70%以上。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社会和经济后果的影响正在削弱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特别是在发病严重的国家。它正影响着劳动力,这转而又对养家糊口者及其家庭产生不利影响。其结果是,所有儿童,特别是艾滋病毒/艾滋病孤儿的未来受到影响。我们不知道这些儿童是否还能继续上学,因为养家糊口的已经过世。通常是父亲先死,然后不久母亲跟着去世,留下孩子由他们的祖父母抚养。

每当有冲突,性暴力就被用作一种战争武器。难民,特别是逃离冲突局势的妇女和女童,有染上这种病毒的危险。据估计,世界各地有 25 万年龄在 7 岁到 18 岁的儿童作为儿童兵积极参加武装冲突,其中许多性行为活跃。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带有艾滋病毒,但是我们可以假设带病毒者比例很高。让他们在社区中为所欲为,他们对被他们抓获者采取性暴力,进而进一步加快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染。

虽然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不是安全理事会职权范围,但是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将大大有助于尽量减轻艾滋病毒/艾滋病对非洲的影响。通过有效地处理非洲的冲突局势,安全理事会无疑将帮助非洲各国政府用更多的资源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敦促武器生产国停止向非洲叛乱运动提供武器。在非洲结束冲突非常重要,以便和平与安全能够成为现实,让非洲各国政府有机会重视卫生和社会发展的优先问题。

让我就维持和平讲几句。首先我要赞扬维持和平人员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工作,他们常常冒着失去自己生命的危险。在这方面,军队和警察部队的训练必须包括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和了解如何保护自己的内容。必须通过预防教育,让维持和平人员、军事观察员和救济工作人员清楚地了解有染上艾滋病毒危险的行为的后果。也必须向这些人方便地提供保护的手段。在遣散前战斗人员,特别是儿童兵时,必须强调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遣散儿童兵应该包括心理咨询和预防艾滋病毒。

我要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对艾滋病在南部非洲造成的悲剧采取紧急因应行动。艾滋病毒/艾滋病是一个牵涉发展、社会和国家安全问题。非洲各国政府已认识到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多方面性质,因此,它们已开始执行扩大因应行动的方案。这意味着艾滋病毒/艾滋病是每个人的事情,不再仅仅是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门的事情。然而,由于缺乏资源和药品,非洲各国政府无法有效地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

目前,现有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资源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相称。据估计,非洲在这方面每年需要 25 亿美元,而可获得的资源只有 1.65 亿美元——我想皮奥博士所说的是 1.5 亿美元。但是区别不大。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向非洲国家政府提供资源并且补助药品。

主席先生,想必你会同意我的看法,那就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大陆在利用照管服务及社会经济安全网以帮助家庭对付这一流行病的冲击方面,机会最少,这是一种有悖于道德的现象。非洲目前获得治疗艾滋病毒药品的机会最少,但得到小型武

器的机会却最多。在遭受冲突蹂躏的国家中,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将其资源用于和平努力,而不是照顾病人。这样,成千上万被感染的人在无望得到医治,使生命得以延续的情况下丧生。

非洲国家政府预防和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政治决心是非常明显的。然而,缺乏资源是一个实际的局限因素,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处理。在纳米比亚,我们将15%以上的国民总产值用于保健和社会服务,但我们在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方面仍然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效。药品的费用对我们来说高得让我们负担不起。

然而,我要提到,就社会动员、提高认识到和宣传问题而言,我们取得了重大进展。记得我曾经去过纳米比亚一个非常偏远的村庄。我在那里遇到一位老人,我问他:“你知道艾滋病吗?”他说,“知道,我听说过,我一直告诉年轻人他们必须使用避孕套;但是,医生,我自己却没有见过避孕套”。因此,我留给他一个避孕套,因为我相信,他被忽略是由于他的年纪。我相信,从那以后,他会一直带着避孕套,将它拿给年轻人看:“这就是我所说的东西”。

此外,纳米比亚政府正在为艾滋病孤儿和养恤金领取人设立一个基金。这是我国总统仅两个月前发起的行动。其目的是帮助那些往往必须照管自己已去世子女所遗留子女的老人。就我所知,纳米比亚和南非是非洲大陆中所有养恤金领取人无论是否曾工作过都一律能领取补助金的唯一两个国家。但是养恤金的数额很少,不足以帮助老人照顾孤儿。因此,我们为孤儿和养恤金领取人设立了一个基金,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非洲国家政府日益被要求将更多的资源用于防治艾滋病毒/艾滋病。但是这些资源从哪里来?今天,受感染的人有一半是15岁至24岁的儿童。其中90%在非洲,从表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对非洲的未来而言意味着什么?能够买得起药品的政府不多,致使必须在预防与治疗那些已经感染的人之间作一个艰难的选择。

因此,我建议以与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相称的方式更加大张旗鼓地纪念世界艾滋病日。例如,我们建议,联合国的世界艾滋病日活动应完全集中于提高对这一疾

病的认识。在提高认识方面仍然需要做许多工作。

今年 5 月,艾滋病方案将在日内瓦举行理事会会议。目前,对付非洲艾滋病国际协作行动正在形成,而且它将在理事会会议上正式发起。我要强烈重申秘书长的呼吁,他要求国际社会:

“在非洲政府的指导下,并在民间社会、私营部门、联合国和各捐助国政府发挥充分作用情况下,制订出与这一危机规模相称的因应措施。”

此外,制药公司在对付这一流行病方面负有道义责任。因此,我们敦促它们以补助价格向非洲政府出售药品,以便我们不致于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人民死去。正如有人正确地提到的那样,我们至少能够延长一位母亲的生命,使她至少能够看见她的孩子读完小学。因此,我们需要在非洲得到这些药品。

最后,我要强调,艾滋病毒/艾滋病现在是我们南部非洲国家的头号杀手。50%以上的医院病床上都躺着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60%以上的儿科医院病床床位都用于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病例。非洲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是可以预防的,我们看到那些已先于我们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事的研究结果。如果能够提供药品,那么这些患者的生活质量是能够得到改善而且生命是可以延长的。艾滋病使我们一些国家的平均寿命缩短多达 10 年时间。

我想与你们谈谈我们在预防领域所采用的一种衡量标准,即所谓的 A-B-C 标准。A 指的是“节制”;B 指的是“忠实于伴侣”;C 指的是“使用避孕套”。我们就是这样设法改变我们社区的行为。让我们携手对付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

主席先生,最后,我要表示我国政府深切感谢你对这一事业所作的奉献。在你访问非洲的时候我没有机会见到你。当时的时机不适合,因为我们正忙于选举。但是你前往非洲,我很高兴。能在这里见到你,我也很高兴。我要感谢你采取这一具体而及时的主动行动,使人们突出关注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影响。我希望现在这将成为安全理事会的例行会议。希望这次会议不会成为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而是成为每年都举行的会议,以便我们都能够对问题进行深入

探讨。

主席(以英语发言):部长女士,感谢你的重要发言、你关于 A-B-C 字母顺序的建议,以及你关于每年至少开一次这样的会的令人感兴趣的建议,我代表我国立即同意你这项建议。

我现在继续发言。因为我们有很多发言者,以及我们想在不久之后进行午餐休息。我希望,这里的非部长代表们的发言将尽可能简短,以便今天下午我们能够就我们听到的发言和我们能够怎样共同工作而进行一些意见交流。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作为新当选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孟加拉国非常虔诚地并以强烈的责任感和坚定的决心履行其职责。

孟加拉国认为,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主持新的千年的第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是非常恰当的。他在此参加会议表明美国对联合国的坚定的全面承诺和对非洲的具体承诺。

偶然但是非常适当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安全理事会以美国担任主席开始。我们赞扬霍尔布鲁克大使将本月用于讨论非洲问题。孟加拉国还对杰里米·格林斯托克大使在联合王国上月担任主席期间领导安全理事会,特别是举行关于非洲问题的重要辩论表示深切的感谢。我们感谢他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努力使新成员在 12 月期间能够参加非正式磋商。

孟加拉国欢迎发起讨论艾滋病对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行动。这是对安全的更广泛内容的承认,即认为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的安全超越了其传统的范围。归根结底,我们所正在寻求的是人的安全;每一个个人无论生活在何处都应感到安全。我们很高兴有机会在安理会关于这个基础广泛的专题的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我们认为,一种全球和平文化可以确保各国和所有个人的这种包容一切的安全。

艾滋病正在迅速传播,这项威胁是全球性的,它是对整个一代人的威胁——甚至可以说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威胁。在发展中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前景是严峻的。对非洲来说,这已经是场灾难。

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 3 300 万人染上艾滋病毒。其中三分之二在非洲。去年,全世界有 260 万人死于这个疾病,这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这些死亡多数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个区域的人均寿命已降到 1960 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艾滋病这个普遍流行病正在严重破坏很多非洲国家的经济。青少年中死亡率的飞速上升正在阻止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由于艾滋病的治疗费用高昂,贫穷者得不到治疗。艾滋病使贫穷的社会更贫穷,并因此使其更容易受感染。专家们预计,在今后二十年中,经济增长的损失每年将至少为 1.4%。

艾滋病的社会影响是惊人的。自从 1981 年以来,1 100 万儿童成为孤儿,他们中的 95%在非洲。象秘书长科菲·安南指出的那样,艾滋病不仅正在剥夺非洲的今天,而且正在剥夺他的未来。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很多国家中,武装部队中有将近一半人染上此病。民事执法由于艾滋病造成的执法人员的死亡而受到削弱。这影响到国家境内及境外的安全以及法律和秩序。非洲军事和民警人员在维持和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由于他们容易受到感染而影响到对和平的维护。

我们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今天上午的发言和他在防治非洲的艾滋病方面所发挥的积极领导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上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会议上。联合国各机构和国民社会组织作为宝贵的合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积极工作应该得到我们的赞赏。世界银行在吉姆·沃尔芬森的有效领导下所做的贡献已得到人们的很大承认。我们特别感谢他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集中涉及贫困和发展问题。

非洲本身正在领导对艾滋病的反击。非洲的领导人正在作出真正的努力以使整个社会参与这场战斗。象乌干达、博茨瓦纳、莱索托、南非、津巴布韦、尼日利亚和纳米比亚这样的国家已经表明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艾滋病的威胁不仅限于非洲;它是对全球社会的威胁。这个流行病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发生的较晚,但它的传播是迅速的。据估计,在今后一些年中,染病者的数目可能会成倍增长。

在克服艾滋病毒/艾滋病这个祸害方面,一些措施应该得到优先注意。

第一,需要加强正在作出的努力,并特别注重青少年和儿童。关于人口和发展问题国际会议(人发会议)的五年期审查的大会特别会议所规定的在 2005 年之前将 15 至 24 岁的年轻人的染病率降低四分之一的目标应该在我们的行动中占主导地位。

第二,需要建立新的和持续的公营-私营伙伴关系,例如南部非洲的“保障未来”方案,该方案已从私营部门为今后五年获得 1 亿美元的承诺。

第三,应该全力支持科学界加快其发展有效疫苗的工作。

第四,应该为人们提供受影响的社会能够付得起的治疗方案。

第五及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应提供充分的资金以抗击这个流行病,发展预防措施减轻已经造成的损害。

最近几年中,我们看到,多数冲突发生在国家范围内。他们有其原因和后果。存在着对安全的军事和非军事威胁,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构的崩溃不可否认是一项和平与安全关切。令人绝望的状况会导致不顾一切的行动。象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的彼得·皮奥所说的那样,就非洲而言,艾滋病所造成的死亡比武装冲突高 10 倍以上。马克·马洛赫·布朗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将其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反叛行动”。为克服这个疾病,我们需要真正的团结精神和有效的战略,而不仅仅是空谈。

如果世界的男女们没有个人的安全,世界就不会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人们现在承认了安全的更广泛内容。我们希望,其他国家将以应有的真诚态度继续进行美国所创始的行动。我们期待着讨论对和平与安全的其他非军事威胁,包括贫穷、环境恶化、毒品、有组织的犯罪等重大的全球优先事项。世界已经改变了,现在是将安全概念也加以扩大的时候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想再次感谢沃尔芬森先生在安全理事会和世界银行的历史中首次参加我们的会议。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将再次邀请他参加我们的会议。我

代表整个安全理事会感谢他今天所做的重要发言和他对我们正在讨论的重要努力作出的贡献。

德雅梅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鉴于你反复呼吁发言要简短,我将减少通常的致敬辞。当然,应该向美国副总统表达这种敬意,并为你组织这次会议和沃尔芬森先生、马洛赫·布朗先生和皮奥博士参加我们的工作表示敬意。

我还认为,没有必要重复今天上午提到的数据,我们的辩论中无疑还会再次提到这些数据,说明艾滋病影响的严重程度,但是,我们谨此感谢美国采取主动行动组织这次会议。我们已经听到的明确地说明,从社会和经济影响而言,艾滋病对非洲国家的稳定确实有影响,因此也对安理会处理的安全问题有直接影响。

因此,我不会强调统计数据,与此同时,我对提到或屏幕上显示的数据涵盖的只是有限的一些国家表示遗憾。在这方面,我要感谢皮奥博士。他同时提到某些国家所作努力带来了积极的方面,从而纠正和补充了我们的资讯。他提到塞内加尔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我认为他这样做完全是正确的。

关于为我们所描述的情况,我们要再次提及,如果我们不警惕;如果我们不就我们今天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呼吁切实采取后续行动,非洲持续的保健、经济和政治危机就会击败我们试图促进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因此,如果我们不能明确和勇敢面对艾滋病带来的问题,我们在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之外的其他会议厅和其他国际场所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乌有。

让我们探讨一下能够采取的积极行动。正如纳米比亚部长先前提到的,我们需要在经济一级动员我们的努力。我不想就此加以论述,只想再次指出,我们要处理的是一种全面的承诺,应该包括一切形式的援助,特别是求助于官方发展援助以及和减免债务的努力。但是,我要集中谈谈我们如何能够更具体和更直接致力于消除艾滋病,并就此指出,法国是向非洲提供公共和私人基金的主要捐助国,自 1980 年初以来便了解需要提供十分具体的援助与艾滋病毒/艾滋病作斗争。

在过去 10 年里,仅为法国援助与合作基金便动员了 6 亿法郎——大约 1 亿美元

或更多——通过 60 个项目集中用于防治、输血安全、医疗监督、支助参与这一领域工作的协会以及支助应用研究。

除这些基本上是公共性努力之外,法国还向多边机构作了捐赠,通过我们的大使馆作了捐赠以及与法国各地方、区域和市级机构进行的分散性合作挂钩的捐赠。这些捐赠加起来大约为 1 亿法郎,法国每年将这笔款项拨给发展中国家对付艾滋病毒/艾滋病。

但我们知道,单单这些努力和各捐赠国的努力不足以应付艾滋病的挑战。正因为如此,我们支持联合赞助的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艾滋病方案)对付非洲艾滋病国际伙伴关系主动行动,这一主动行动的目的是加紧动员整个国际社会,法国打算积极参与这一主动行动。

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国际治疗团结基金,这一基金将接受公共和私人捐赠,其目的是使发展中国家人口更容易得到艾滋病的治疗、包括抗回复性病毒治疗。除了直接的好处外,这一主动行动将为受这一疾病困扰的南方国家人口带来新的希望。

在 2 300 万非洲人已受到感染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回避发展中国家得到治疗和未来的疫苗的问题。艾滋病突显了富国和处境最为不利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造成了几乎难以承受的不平等,因为这种不平等影响着最根本的权利,即生命的权利。

正如法国卫生部长库什内尔博士在 1999 年 7 月专门讨论开罗会议后续行动的大会特别会议上提出的,我们对北方能够享受治疗而病人却在南方这种情况能够忍耐多久?简言之,我想这正是纳米比亚部长先前坚信不移地提到的。我们不能仅仅集中关注预防。2 300 万非洲人经受到感染。我们还需要考虑治疗的问题,而治疗却很昂贵。因此,这一治疗团结基金引人注目。

为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我们需要动员基金,需要勇气承认:是的,如果我们不仅局限于预防而是也要试图提供护理和治疗,就需要花钱。制药工厂也必须更加有计划地向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提出修订的财政条件,便利就缺少向发达国家的平行

或连续出口问题提出保障。的确可以采取具体的主动行动。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联合国能够就此问题有益地组织起协调的行动,使生产国、捐助国和受援国和解接近。这是我们希望本次辩论能够促成的一个具体主动行动。

在我们看来,目前的时机很好,可以在艾滋病方案的主持下开列出目前开展的所有双边和多边行动的原始清单,以便确保这些行动具有一致性,地理上和医疗——社会方面具有互补性。正如皮奥博士先前提到的,我们看到一些国家避免了这一重大流行病的扩散。这其中必有原因,我们也许应该期望在双边和多边行动中进行进一步合作。

最后,所有捐助国可保证考虑采取一项可能的行动,就艾滋病毒/艾滋病进行合作,并可审查每一项行动,看看如何减少这一流行病的影响并加强预防和获得保健的机会。

最后,我认为我们应该强调秘书长可在这一领域发挥的关键作用。我们要再次表示感谢他光临并参加这一辩论,以及为辩论确定了基调。秘书长拥有政治和道德权威以继续保持我们的集体认识,以便保持每一个国家对于这一议题的警惕性,以便制订我们的行动方向,并确保我们的行动与我们今天听到的慷慨之词相一致。

因此,我认为由于秘书长作为道德权威——我强调作为一种政治权威——所表示的承诺——由于这一承诺和由于根据他的倡议我们今天必须作出的努力,我们可能发现消除这一疾病是可能的,并为非洲国家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性。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荷兰大使。然而,从程序上讲,我要与安理会磋商一分钟。根据安理会的规则,安全理事会成员的部长优先发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由美国副总统和纳米比亚部长发言。然而,根据这些同样的规则,安理会成员有权在其他非成员国部长之前发言。

在前几分钟,我收到了一些非洲国家常驻代表的若干说明,向我指出,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打破程序性顺序,允许乌干达和津巴布韦卫生部长参加会议并在接下来排定的发言者,即荷兰、阿根廷、加拿大、马来西亚、联合王国、突尼斯、乌克兰、马里和牙买加以及根据安全理事会规则然后是乌干达和津巴布韦代表之前发言。

我提出一项非正式建议,即下一组发言者让两位来自非洲的部长先发言,我要问一下——我知道这有点不寻常,因为我们通常将休会并开行政会议,但是我们显然不能这样做——是否有任何发言者愿意谦让,以使我们能够听取应其各自总统的亲自请求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的两位卫生部长的发言。我已就此事亲自与穆沙韦尼总统和穆加贝总统讲了话,他们俩都告诉我,他们部长的讲话是多么重要。我要问,安理会成员是否同意请来自乌干达和津巴布韦的部长同我们一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不按顺序发言。

各位代表是否同意这项建议?

我愿感谢安理会成员允许改变程序。

应主席的邀请,基永加先生(乌干达)和斯坦普斯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我荣幸地请乌干达卫生部长发言。

基永加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就这一非常重要的议题——艾滋病毒/艾滋病向安理会发言。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尽力归纳我的发言。

既然乌干达被举例为已取得一些进展的国家之一,我认为我粗略地介绍一下我国的情况以及我们已经作出的一些努力和这些努力已产生的一些不大的变化,这对安理会成员来说是公平的。

乌干达人口大约为 2 000 万人,增长率为每年 2.5%,我国大多数人生活在乡村地区;只有大约 12%为城市居民。乌干达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300 美元。尽管过去 10 年来我们在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就资源而言我国的情况仍然非常困难。

平均寿命因艾滋病而下降,现在大约为 47 岁。婴儿死亡率仍然高达 97,产妇死亡率仍然高达每 10 万活产中有 504 个。获得保健的机会一般很差,只有 50%人口在周围 5 公里之内有某种形式的保健设施。

艾滋流行病早在 1983 年就袭击我国,我们估计,我国大约有 200 万人患有艾滋病毒/艾滋病。在这些人当中,92%是成人,12%是不满 12 岁的儿童。城市人口比乡村人口更多感染艾滋病毒。正如其他国家所说的,艾滋病毒感染在年轻女性中比男性更加普遍。加上异性传染普遍,这造成母亲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孩子。据估计,乌干达全国血清反应率为 10%,母亲传染给孩子率为 25%,每年 25 000 个儿童出生时已经感染艾滋病毒。

艾滋流行病对我们在我国已经控制的肺结核重新出现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国大约 60%肺结核病人感染艾滋病毒。我们还注意到,呈艾滋病毒阳性和感染肺结核的人对肺结核治疗的反应不太令人满意。

艾滋病毒/艾滋病威胁我国的安全和发展。在过去 10 年中,这一疾病已在我国夺走 50 多万人的生命。许多儿童因艾滋病毒/艾滋病成为孤儿。这些儿童目前正由其年迈体弱的祖父母或兄弟姐妹照料。艾滋病正影响社会上最积极的成员,包括诸如医生、工程师和行政人员等拥有高度熟练技能的人。因此,艾滋病毒/艾滋病有可能断送我国近来取得的社会经济成果。

我们在国内对于这一流行病作出了什么反应?莫塞维尼总统的领导和对控制这一流行病的承诺为强大的国家和国际力量联盟提供了机会,以便在乌干达与艾滋病毒/艾滋病作斗争。因此,学术界、政界、宗教界和文化界领导人以及各社区对这一疾病作出了广泛的反应。

在关键政府部门建立了性传染艾滋病控制计划,包括武装部队、教育部门、农业部门和负责劳工事务的部。教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以及基于社区的各组织,对抗艾滋病毒/艾滋病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截止 1994 年,4 000 多个非政府组织已经登记,提供有关艾滋病毒/艾滋病照顾、预防和常常是支助的计划。我们所利用的关键干预之一,就是通过电台、电视台、戏剧、歌曲和广告牌而进行相当明确的公共卫生教育需要在此阶段提到,生活在艾滋病毒/艾滋病之中的乌干达人对这一做法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公开宣布其血清状况,并告戒其他人避免传染。

在 1997 年开始的由联合国共同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赞助的获得药品方案之下,只有大约 1 000 名乌干达人受益于艾滋病毒/艾滋病抗逆转录酶病毒治疗。这主要是由于药品的高昂费用。据估计按月供应药品每名病人每年花费大约 12 000 美元。在估计有 200 万乌干达人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下,普遍获得药品将花费我们 240 亿美元。这同我们的 20 亿美元的年度预算形成对比。显然,这对一个象乌干达这样的穷国来说是支付不起的。

尽管为生活在保健设施和社区中的患有艾滋病毒/艾滋病者的支助方案作出了一些努力,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这些方案的最终目标是恢复希望并鼓励病者寻求医疗照顾。

我所谈到政治意愿以及我国出现的有关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开诚布公的态度大大促进了乌干达参与艾滋病毒研究的努力。与美国和欧洲的最佳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帮助建立了乌干达的研究能力。已出现了一批在流行病学、行为科学、艾滋病毒学、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训练有素的核心研究科学家。这些科学家提出了艾滋病毒流行病学及促成其扩散的行为危险因素的特点。由于进行了这些研究努力,在除正为加强国内的艾滋病毒/艾滋病研究试验室所进行的一切努力之外,还建立了一批精心设计的队伍。

最近,乌干达的研究在寻找一种防止艾滋病毒/艾滋病母子传染的药品方面取得了有希望的突破。美国最佳科学家同其乌干达同事一道,已确定一种称为 Nevirapin 的药品,同 AZT 相比,具有把母子传染的情况降低 50%的潜力。有了这种功效,估计在乌干达有 12 500 个婴儿可在出生时免于艾滋病毒的感染。估计每名妇女仅对 Nevirapin 药品本身的花费大约 4 美元,还不算行政和供应费用。这同目前在发达国家正使用的利用 AZT 对母子的治疗的 150-200 美元的费用形成鲜明对比。因此, Nevirapin 的利用有希望成为在象乌干达这样的资源贫乏国家中预防母子传染的最恰当和可持续的战略。

乌干达在同世界其他国家一道争取解决这一疾病的努力中,已开始测试疫苗试

种者。这同样是在与美利坚合众国的最佳科学家一道合作进行的。在本次会议期间,安理会已听到乌干达取得了一些突破,我现在借此机会谨援引我认为乌干达在其中取得一些成功的三件事。

第一件是在行为改变方面,1995 年乌干达人口和卫生情况调查确定,已在乌干达实现了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接近普遍的意识。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我国已有大批人现在只有一名性伴侣,而且使用避孕套,这在开始流行时被认为是不能在我国谈论的禁忌。然而,现在避孕套已到处可得,并且正大量使用。

第二项成就即我们能够去掉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恶名。这方面的证据就是发现带有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人自己正站立起来,宣布其血清状况,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告诫同胞们避免他们所犯的错误。很多人正转向接受化验,以便能够知道他们的血清是否呈阳性。由于这种行为的改变以及我们所观察到的去掉恶名的情况,我们在 1991 年到现在这段时间中看到我国此种疾病流行情况的下降。

尽管如此,我们仍看到我们面前有巨大的挑战。首先,这一流行病仍具有十分高的 10% 的血液传染率,200 万人正受到传染。但我们显然想继续前进并深化这一方案。一个方法就是进一步加深行为改变。我们看到,在我们一些族裔中长期确立的文化准则有利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染,我们想加强该方案以便能够促成这种行为改变。

我们缺少资源,是一个穷国。经扩大的家庭和政府支助系统都正承受着照顾孤儿和艾滋病患者的负担。正如安理会已经了解到的那样,提供抗逆转录酶病毒药品的费用在象我们这样的国家是支付不起的,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在这方面给我们帮助。我们乐于指出,Nevirapin 很可能会阻止由母亲向儿童的传染,我国打算在国际援助下,非常迅速地开始广泛使用这一药品。归根结底,我必须强调:最终将制止这一流行病的是找到抗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有效和低成本的疫苗。因此,在该问题上必须发动国际团结。

最后,我要告诉各位代表:乌干达严重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情况威胁到国家

发展,可能使贫困情况恶化。在我国已经采用了控制和预防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可支付的措施。我国和我国人民支付不起发达国家目前采用的治疗的高昂费用。我们认为,找到有效和支付的起的疫苗,是对这些药品的唯一可行的替代物。然而,我们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帮助我们支助那些孤儿和生活在艾滋病毒/艾滋病中的人。

因此,我代表穆塞韦尼总统和乌干达政府,谨对阿尔·戈尔副总统对抗艾滋病毒/艾滋病所宣布的支持表示感谢。我还谨借此机会呼吁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人类中那些处境较好者加入这种声援,帮助世界上那些处境不利者。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指出,就在乌干达卫生部长在纽约这里与我们在一起时,克林顿总统的艾滋病问题特别顾问桑迪·瑟曼今天正在他的国家会晤其同事和总统。因此,我们非常感谢他今天出席会议。

下一位发言者是津巴布韦的卫生和儿童福利部长。我请他发言。

斯坦普斯博士(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全世界最近做了一件花钱很多而基本上未经协调的工作以消除一些人损失一些钱财、一些地方损失一些数据和一些人打乱他们繁忙的时间表的危险。对我们某些人来说,在现实世界中,这只使我们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各宗主国中聪明的人对于非洲大陆过去 15 年中发生的事情竟会如此健忘、如此色盲。

据估计为千年虫这个对我们肯定是基本上不相干的威胁花费了 6 000 多亿美元,而这个世界的一般人士却看到在同国际经济增长并无重要联系的各地区中艾滋病毒流行病的巨大增加。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谚语所说的报应将要临头了。非洲也许是由于苏彝士运河而成为世界最大的人工岛、但是人对遥远和不为人知、更不用说危险的目的进行探索和开发的难以满足的欲望总要战胜任何防疫地带、任何岛屿心态或科学、医学或礼仪所规定的任何清醒或合乎逻辑的谨慎作法。因此国际社会要对我国和非洲正在发生的这个流行病所造成的种族毁灭置之不理是徒劳的。我们对于我国一些领导人所受到的谩骂已经习惯,甚至适应了。我们已经接受

了各国际机构一再作出的虚假说法,即除了一个国家之外,在艾滋病问题上非洲没有政治领导。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之中许多人,包括我国,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使我国民众了解行使人的一种完全正常、必要和完全愉快的功能会有致命的后果。从所谓的西方娱乐业推动淫乱享乐行为、不顾潜在致命后果,以及北半球青年妇女中艾滋病毒阳性的人数迅速增加中,我注意到宗主国可以从我们那里学到一些东西。

在津巴布韦,个人性传染的感染率在 1990 年达到高峰,从那时以后一直下降。新艾滋病毒感染率 1995 年达到高峰,并在其后下降。然而,津巴布韦目前是世界上艾滋病毒血清阳性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当然这个阳性率是从监测数据推断中得来的,而选择的地点原先是为了早期发现新的感染。因此,我们国家数据主要来自产前民众、性病诊所就诊者和医院住院病人。我们正在热切等待的是这些数字是否由于健康的人到我国自愿咨询和检验中心去检查他们的艾滋病毒状况而会有所改变。只要说这点就够了:少量的自愿献血者——约 8 000 人——中艾滋病毒血清阳性反应的人少得多,而且人权在逐步下降,表现了从 1994 年以来血清转换率的大幅度下降并表明积极的行为改变是现实可以做到的。津巴布韦在非洲独一无二地检查了自从 1985 年 9 月以来的献血是否含有艾滋病毒,我国是在当时发现第一例的。

到 1999 年底,津巴布韦国家艾滋病政策在经过三年半全国广泛磋商之后已经完成,国会批准了建立涉及所有利害相关者的国家艾滋病委员会的法令。国库规定了为所得税和公司税收取 3%的艾滋病款以使该委员会活动有可靠经费来源。原先试图设立一个跨阶层的国家艾滋病委员会,但是失败了,因为它过多依赖捐助者的支助,也因为卫生部投入不足,以及缺少执行职能。

我国总统在 1999 年 12 月 1 日世界艾滋病日在首都长达一天的大会上发动了这项创新,参加者超过 5 000 人。最近在 9 月开会的儿童国会发展的学龄儿童的发言和要求特别富有挑战性。

目前的挑战是切实、一贯和全力对付这一流行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承担艾滋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所造成的破坏的健康、经济和社会后果,更不用说一个正在经受极端经济困难的国家,这个困难是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缺陷、贸易条件的不利、经济改革方案使几乎每一个津巴布韦人更加贫困以及偿还债务负担消耗了政府预算的 38%以上,仅利息率就是整个保健预算拨款的四倍。

因此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通过本月份主席美利坚合众国所表示的关切,以及有机会不仅提出我们统计数字,而且向这个有高度影响力的机构谈谈我们的成就和建议,确信人们将倾听我们的呼声。

我们需要审查和纠正那些对我们克服这一灾难进行的阻挠。在津巴布韦我们每周因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而死去近 1 000 人;其中 15%是五岁以下儿童,他们受父母感染;我国保健机构开支的 27%用于治疗与艾滋病有关的疾病,而且往往无效;我们无法取得现代疗法;哺乳是普遍做法,联合国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所说的可接受的替代办法对于除了少数富有的城区家庭之外、对任何人都是不切实际的。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这难道仅是缺乏了解,还是种族歧视的新形式,即又一个种族清洗的过程?富国广泛指责我国虐待两名记者,我们已将此事交付法庭审判,然而却要我们同意,不给那些需要进行治疗的人治疗不是违反人权,健康权是一项至高无上、普遍的权利。这一疾病影响每个人——穷人和富人;城里人和农村人;雇员和雇主以及失业者;受过教育和无知的;已婚者和独身者;年青人和老人;居民和游客。

受丈夫感染的富有的交际花玛莉·费希尔几年前在休斯顿举行的美利坚合众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简洁地指出,“艾滋病病毒对于受其袭击的人只问一句话:‘你是人吗?’”。

我感谢安理会听取我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部长先生,感谢你出席。我们希望你将留下来参加今天下午的讨论。

名单上下面发言的是安理会成员,他们依次是荷兰、阿根廷、加拿大、马来西亚、联合王国、突尼斯、乌克兰、马里和牙买加。由于时间已晚,我十分感激他们极有耐心。如果他们可以接受的话,我建议我们会议暂停至今天下午 2 时 30 分。

下午 1 点会议暂停